

# 再好的文化“清汤”，喝多了也会腻

□于里

7月23日,《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在此之前,该系列第一季在年轻人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2017年至今,文化类节目集中涌现并接连走红。有评论人士感慨:文化类节目“火”了,文化类节目的春天到来了。不过,是不是所有的文化类节目都叫好又叫座?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或网络平台扎堆制作文化类节目,甚至出现不少模仿、克隆之作,这样的文化清流会不会有一天也让人感到有点腻?

回溯2018年第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文化类节目,当数央视《国家宝藏》。在公众的直观印象中,文物小众、沉寂、高冷,许多人对文物的态度是隔膜的。事实上,没有沉闷的文化,只不过是缺乏与之匹配的表达,而《国家宝藏》找到了文物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去高冷”,内容依旧是严肃的,但节目形态娱乐化、年轻化,比如尝试“混搭风”“文化+明星”“文化+小剧场”。明星守护人的设定,让严肃的节目有了娱乐的外壳;明星小剧场的演出,则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有效传递出了文物的历史背景。

同样,《如果国宝会说话》依旧是“年轻化+娱乐化”的策略,节目一改旁白曲折而高冷的学术性叙事,而是在每集5分钟的时间里,让文物开口说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节目还选择在以年轻人为主

体用户的视频网站投放,还一本正经地制作了表情包,成功地在年轻人群中圈粉无数。

打破文化高冷的刻板印象,让文化走下神坛,获得一种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并实现与现代生活、现代观众的顺畅对话,无疑是必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文化包裹上娱乐化的外衣,让文化“去高冷”,接地气,这种娱乐化的边界是什么?这个度该如何把握?笔者注意到,在这两个节目走红之后,一些地方台以及视频网站也推出了类似的文博科普探索类节目,却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行选秀娱乐之实,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欺骗观众。如此,非但弘扬不了传统文化,还会拉低文化类节目的品位和格调。因此,如何“去高冷”,让文化“化”更多人,又要避免媚俗和娱乐至死,仍是文化类节目亟需探索的议题。

观众对于文化类节目的热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这几年来扎堆的明星真人秀的审美疲劳,这就像是吃惯了油腻的大鱼大肉或者重油重盐的快餐,终于端上了一碗平淡味甘的清汤。应该说,文化类节目的崛起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央视推出几档颇受好评的文化类节目之后,一些地方台是在准备不足、思考不充分的情况下,按照别人的模式匆忙制作同类型节目,导致这一类节目目前有跟风与同质化的倾向——看一下从去年至今各地出现的文化类节目,“中华”“诗词”“汉字”“国学”在名称上频繁撞

车,相似程度颇高。

另一方面,自从央视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中采用了晋级赛+专家讲解的模式,不少地方台纷纷效仿;《朗读者》的朗读+故事模式,也被复制到了一些同类节目中。这些做法,都造成了节目在形式上创意单一、看点单一,虽然细节各有差异和侧重,但总体上大同小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既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也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上古神话、经典古籍、文学作品。如果说制作节目像做菜,那么文化类节目有着得天独厚、丰富多彩的珍贵食材,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做法。如果每一样食材都是同样的炒法、同样的配菜、同量的盐分、同量的味精,那么,再珍贵的菜肴也会有让人腻的一天。

文化类节目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它能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传播,不断丰富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内涵,为观众提供新的精神指引,也能够丰富观众的业余生活。当下文化类节目已经走过了“有没有”的1.0阶段,现在就得好好琢磨如何向“好不好”的2.0阶段迈进。“好”不仅仅是有更优质、更具独创性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于拥有更广泛的受众和更强大的传播力。这是文化类节目亟需应对的挑战:如何在保证文化品位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节目形式,制造新的看点,让更多人喜欢并接受,让文化“化”更多人?

【读书有感】

## 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赞美

批评家张定浩在书中谈道,“我有时会觉得,要准确感受一位其他语种的诗人,单靠原作和现有的翻译是徒劳的,更有帮助的,是他本人谈论诗歌的散文著述,以及借助另一位和他同语种诗人的眼睛和耳朵。”读完诗人余秀华的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我也有相似的感受。不得不说,要想走进诗人的内心,读她的散文作品是一条捷径。细碎、具体、温煦又尖锐的体验,散文集中还原了一个更真实、更积极的余秀华,或者说,她本来就是挣扎向上、抗拒平庸、追求自由的风中野草。

成名后的烦恼,奶奶的故事,母亲患肺癌去世,小院里的生活,消逝的横店村,爱慕的心上人,这些被余秀华写进了散文中,平凡中给人以细微的感动和思考。如果用一词语概括就是“柔弱”。柔弱不是怯弱,而是内柔外刚,“柔弱胜刚强”,就像作家史铁生曾写到的,“柔弱是爱者的独信”。在我看来,这是诗人看透了生命本质后的豁然和了悟。从“是什么支撑着余秀华的名字在世界上游荡了40年”发问,她在深邃思考和独立行走中找到答案:我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唯一的好处是不虚伪。不虚伪就是真诚。

“生命如同上帝给一个人买了一部手机,你爱惜着用,可以用很多年,摔碎了就没有了,上帝也不富裕,没钱给你买第二部。”书中,这样充满禅机的句子俯拾即是。同样作为折翼天使,我顿悟到,余秀华的散文,指向的是灵魂深处的开掘,她没有回避外在声音,她是用诚实的活法和主动的姿态参透人生这本大书。在《也说死亡》一文中,她说,“一棵野草,除了不要命地生长,除了在巨大的创伤后还能欢喜如常地拱出地面,没有比这更高的生命礼赞。”写到多肉植物“幽女”从四片叶子长到十四片叶子时,她说,“这是生命在积累,在喜悦,在爱。”

人们读余秀华的诗歌,用嘴巴或心灵。几乎同时,余秀华也在读自己,“诗歌通向灵魂,灵魂只能被自己了解,诗歌不写自己能写谁?”她写陪伴奶奶的狗,写母亲去世后的生活,写新房子里我和父亲的孤独,写春天初至的村庄,写自己的乡愁,被时代裹挟向前的身不由己和担忧,她不轻易承认失败,“我的乡愁是血淋淋的愁,它不是什么东西从你的手里拿去了还可以还给你,而是一块骨头从你身上剔出去了再无法长回你的身上。”说到底,她写的是内在空旷而荒芜的孤独感,是“捂着被子不敢哭出来的痛楚”,我从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克制和心灵的隐忍,看到现代人共同的生命困境。就像书中她对心上人的真挚表白,“有时我想,我所有的努力,命运所有的安排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在我的位置上如此欢喜地看见你。可是,我是贪心的,我想要生命为我打开得更广阔更深邃……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几乎表演般地用力。”

余秀华用诗歌做盾牌,与荒诞不经的世界擦身而过。身体的残疾使她跌跌撞撞,而诗歌又赋予她精神的某种平衡,她在风中捕捉美好、分享喜悦,用微弱的光照亮他者的心灵。就像她所说,“生命如禅,它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它一定给予出来了,因为这也是跟随生命一起到来的自然之道……大道无形,我们看不见的正赋予了生命的广阔。”

□钟倩

# 姜文的情人,是北京

□韩松落

自从电影诞生,就与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电影和城市,是情人的关系。姜文电影里,就藏着一个永恒的情人,这个情人,就是某个城市。如果要给这个城市找一个最接近的模板,那必然是北京。电影《邪不压正》拍的就是他梦中的北京,从童年开始,一直身在其中,但又不不断想象的那个北京。这个北京,并不是现实中的北京,而是经过他梦幻化的北京。

原著《侠隐》的作者张北海出生在抗战前的北京,后来定居纽约。他对北京的印象,建立在他在北京经历的日常生活以及上代人的讲述,还有自己的想象的基础上,因此充满了种种日常细节,北京的街道、吃食、穿着打扮,乃至上流社会的夜夜笙歌,都是他着力描述的对象。姜文对《侠隐》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北京成为他电影真正的主角,但这个北京,不只有美景和美食,而是一个更大的北京,承载了更多历史分析、时代隐喻、国民性格批判。姜文的北京比张北海的北京有底气,也更有视觉。张的北京是味觉,一碗碗北京小吃连缀起来的北京,关大娘只动口不动手,隐忍又风流;人人都有一肚子的心事。那个北京,如果真要拍,是李安来拍;姜文的北京,是力量和性情构成的北京。

对北京有特殊感情的,不只有姜文。在众多北京迷梦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民国时代的北京,那个被特意称作北平的城市。对这个老舍来说,北平是真爱,而“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郁达夫说,为留住北平的秋天,他“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梁思成在不知道自己的发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情



况下,也认真地建议着:“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小说《城南旧事》里,北京也是那么沉静,幽深的胡同,浓荫匝地的院子,质朴的女佣人,憨厚的人力车夫,悠长的时光,值得安放一个童年、一段乡愁。

这么多人写过、画过、拍过北京,但姜文的北京,仍然是最特殊的一个,因为他的北京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邪不压正》中的北京,看起来非常真实,细节都经过考证,房屋、物件,都是不惜成本搭建的。在整个背景上,各路传奇与市井社会快速切换,最不寻常和最寻常的意向共同存在。种种看似矛盾的情景造成的反差,却无一不令人印象深刻又感到异常熟悉。但在极度真实的现实细节的基础上,铺陈了导演姜文极度不现实的魔幻色彩。

电影里多次出现过宽阔的城

墙,那个城墙,显然不是真实的北京城墙,而是根据梁思成先生的构想制造出来的,宽阔到可以跑飞机,给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远离尘嚣、可以休憩的地方。但这样的地方,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姜文心中的北京,是北京又不是北京,事实上,他电影里的那些地方,都有具体的形象和名字,却又不是那个地方。姜文曾这样谈论他的创作心得:“无中生有出一个似乎存在的,让你觉得比现实世界还真实的一个世界,这就是一个创造过程。”“有时我甚至分辨不清楚现实生活和电影生活的界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更需要电影生活。”

姜文是一个生活在大梦里的人,他生活在北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由他构想出的北京。这个北京,浓荫遍地,鸽哨漫天,又光怪陆离,处处玄机,是一个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乌托邦。

《邪不压正》的片尾,当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爬上房顶,望着一色灰瓦晴天的城市天际线,大声呼喊着“巧红”的名字,他心中真正呼唤的,又何尝不是那个令人魂牵梦萦而又百感交集的北京呢?